

百年苦夢

孙郁著

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百年苦夢

孙郁 著

20 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苦梦:20 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/孙郁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. 11

(回望文丛)

ISBN 7 - 5633 - 6279 - 7

I. 百… II. 孙… III. 知识分子—心理状态—研究—中国—20 世纪 IV. D663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7331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(网址: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 × 1 300mm 1/32

印张:10.5 字数:290 千字

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0539-2925659)



作者简介

孙郁，本名孙毅，1957年秋出生于大连，著名学者，现为鲁迅博物馆馆长、《鲁迅研究月刊》主编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副主编。主要著作有《鲁迅与周作人》、《鲁迅与胡适》、《文字后的历史》、《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》、《鲁迅书影录》、《胡适影集》等，并主编《回望鲁迅丛书》、《回望周作人丛书》、《被亵读的鲁迅》、《苦路——中国的文化怪杰》等。

内容简介

本书以感悟的方式，对近百年文人和文化进行了一种散点透视，是文学史、思想史的一次有趣的穿越。作者被无数沉重的话题缠绕着，从近现代至今，一些重要的精神闪光在此汇聚着，且形成了对话的底色。不安的、骚动的激情与矛盾的、困惑的语序，隐含着历史的明与暗，人性的曲与直。无数悲怆的灵魂被重新唤起了，游荡在今人的思绪里。作者从那些直面现实和不断抗争的知识群落里，提炼着今天有参照意味的因子，旨在于此寻找精神的另一种可能。全书苍冷沉郁，在历史的长影和当下的风雨间，折射着读书人的犹疑和坦然。

回望 文丛

主编◎向继东

笔底波澜：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 傅国涌 著
百年苦梦：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 孙郁 著
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（1937 - 1947） 朱鸿召 著（即出）

主编简介

向继东，资深编辑，湖南溆浦人，生于20世纪50年代。编辑文字，也写些文字。著有散文随笔集《生活没有旁观者》、文史随笔集《历史的真相》，主编有“往事书系”、《2005中国文史精华年选》、“回望文丛”等多种，曾任《随笔》特邀副主任，现供职于某省报。

电子信箱：xjd53@yahoo.com.cn

组稿编辑/周筱赟
责任编辑/周伟
责任质检/周筱赟
装帧设计/张媛俪
封面书法/赵孟頫

目 录

- 章太炎：旷世奇音/1
- 梁启超：启蒙的悲欣/15
- 王国维：辉煌与沉寂/28
- 周氏兄弟：绝望与逃逸/45
- 陈寅恪：“遗民”歌哭/62
- 胡适：自由之梦/77
- 梁漱溟：拯救儒学/92
- 茅盾：苦涩的初梦/103
- 瞿秋白：悲剧人生/114
- 李何林：一个布道者/129
- 巴金：反抗与忏悔/140
- 张中行：哲思与激情/161
- 费孝通：乡土情怀/173
- 钱锺书：写在人生边上/185
- 唐弢：未完成的雕像/196
- 王瑶：拖着历史长影/207
- 汪曾祺：古魄新魂/216
- 邵燕祥：诗人与战士/225
- 王蒙：从纯粹到杂色/241
- 钱理群：在鲁迅的背影里/252
- 张承志：血色的圣火/263
- 赵园：另一种品位/278
- 史铁生：通往哲学的路/286
- 贾平凹：西北人的道行/299
- 王晓明：历史的宿命/306
- 鲁迅传统：不朽的主题/317
- 后 记/329

章太炎：旷世奇音

1

章太炎离我们似乎很远了，不仅其文字在日益疏远着现代人（他行文的古奥，今人确难以卒读），另一面，他的人生态度、生存状态，今人要做到，恐也很难。张中行在《负喧琐话》里写到他时说：

提起章太炎，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，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。多种怪之中，最突出的是“自知”与“他知”的迥然不同。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，比如明朝的徐文长，提起青藤山人的画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爱，可是他自己评论，却是字（书法）第一，诗第二，画第三。这就难免使人生疑。章太炎先生就更甚，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，这就不只使人生疑，简直使人发笑了。^①

翻看章氏弟子写他的文字，大致都可让人感受到这一点。章太炎的怪，是与他的学识的深连在一起的。而更主要的是，在中国的近代史中，他是一个很杰出的人物。应当说，推翻清朝统治，章氏的思想、人格，对当时“排满”的英雄们，有着巨大的影响。辛亥革命的思想源泉之一，是“汉学”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民族精神。自汉朝以来，治学者从未有以学术精神引发出一场革命，且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，而唯有章太炎那一代人做到了。这是中国“汉学”史最辉煌的一页。有趣的是，正是在这闪亮的一页里，我们和这位学界巨子相遇了。

^① 张中行：《负喧琐话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5页。

我最初对章太炎粗浅的认识,来自于鲁迅。那篇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直到今天,仍是我至佩的妙文。后来看到周作人、许寿裳等人关于太炎先生的回忆文字,感觉好像更多了。直到有一天,静下心来读他的著作,才发现,理解这位巨子,并非易事。他太富有,又太矛盾;太高傲,又太富有人情。我以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优美的与陈腐的、伟岸的与狭小的东西,他那里都有。这使我对他的描述,充满了困惑。在半是神秘、半是敬重的心境下,我对自己的感觉,好像失去了自信。

鲁迅说,“我以为先生的业绩,留在革命史上的,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”。^①这是对的。但太炎先生对我的魅力,似乎还是在学术里。我一直更关心着他的学术思想如何转化为一种社会思潮,那些锐利的社会学、哲学的观点,怎样嫁接到那一代人的躯体里?也许,这里便有“士”阶层与更广大的世间民众奇妙的心灵呼应吧!可惜到了20世纪末,这类的呼应,似乎已经消失,章太炎在世间的寂寞,已属必然。

2

但在他的遗著里,我隐约地还可以感受到那颗跳动的灵魂。我承认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文字,可在那博识中有时生出的鲜活的生命意志,确给人以兴奋的感觉。我曾经对人说过,20世纪的中国,有四个人的学术传统正在成为绝学:王国维、章太炎、陈寅恪、钱锺书。鲁迅有无数的追随者,周作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,至于胡适,越来越被后代知识分子所看重。而唯章太炎等少数人,其文其字,已成绝响。不知这是幸事,还是憾事?

章太炎的复杂在于他的博大与怪癖、深刻与偏执。这种状态,是难以被众生所接受的。他对古中国文化的一些解释,确令人叹为观止,但他在其中生成的某些人生观念,又常有悖于现代人格的地方。例如他的反对新文化,倡导读经,等等,与梁启超这一些人比,并无什么区别。鲁迅说他晚年“既离民众,渐入颓唐”,都不是夸大之词。所以,终其一生,在人们脑子里,有两个章太炎:一是不畏死灭,以文为利器,排满抗清的凛然男子;一是埋头著述,浸于古代,与时代渐渐隔膜的学究。对于一个人求全责备是偏颇的,但章太炎给人带来的复杂感受,确也使人感到,知识分子在心理结构上真正摆脱传统的阴影,是大不易的事情。

^① 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,第545页。

2

晚明以来,文坛便涌出许多怪人。敢骂孔子的李贽,为民歌哭的金圣叹,傅山的孤傲,徐渭的反俗,至今都是佳话。比起上述诸人,太炎先生似乎更有过之。他一生颇为传奇,埋头著述,维新图强,主编报刊,佛学救国,力主读经……从大骂袁世凯所表现的浩然正气,到与世隔绝的迂腐自语,这其间,多与世间处于不和谐的碰撞中。“独行孤见”、“不惑时论”、“立说好异前人”,都是他的特点。他的怪,并不是轻薄为文者那样的草率,看他的书,很让人佩服其博大学识。考其一生,我觉得他把学术革命化了,思想人格化了。中国治汉学者,在晚清可谓人数众多,但能像他那样,既得国粹真义,又能参之西学,并从中跳将出来,独辟蹊径,可说少得可怜。康有为治学时也颇有建树,立新学说,倡明变法,也可说大气磅礴。但就怀疑精神而言,似不及章氏。章太炎一生好出怪论,发世人不或不能之言,以致使人讥为“疯子”。连他自己也承认:“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,不是神经病人,断不能想,就能想也不敢说。说了以后,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,不是神经病人,断不能百折不回,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,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。”^①他一生的思想,总是在变化,与人相处,也多有冲突,个性强,怪论多,世人多难以理解。但因为性情真,有锐气,且在反满抗清中视死如归,那气魄,又让人刮目相看,影从者一直不断。他一生,游历于学术与政治之间,做什么,都不走中庸的路,文章多逆世之音。在“诂经精舍”的七年中,他潜心治学,对千年的典籍,进行了深入的研讨,功底扎实,连他的老师俞樾也称赞不已。但他偏偏不泥于古文,遂将兴趣转向西学,精神由此也为之一变。1897年,29岁的章太炎来到上海,成为《时务报》的编辑,那时他热情地加入了康有为、梁启超诸人主张的维新变法之中,此间写下大量奇文,抨击清王朝的专制。但不久,他便与康有为派发生冲突,竟动起拳脚。章太炎蔑视康有为尊孔思想,对今文经学的华而不实,生出厌恶。这次冲突,对他自然是个打击,于是又转变方向,想投入张之洞的门下。但个性很强的章太炎,不会得到好的结果,后又被人逐出门庭。此后他漂流台湾、日本,回国后两次遭监禁。尤

^① 章太炎:《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》,《民报》第6号,1906年7月25日。

其是“苏报案”中，他与邹容被押解监狱，其与清朝统治者抗争到底的气概，是惊天地、泣鬼神的。作为民族的志士，章太炎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财富，所谓气节，在他那里，是凜然浩大的。即使辛亥革命胜利后，他对孙中山、袁世凯不卑不亢的态度，照例让人看出他“矜奇立异”的一面。

我常觉得他身上有种尼采式的气质，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，他又多侠气。他在《明独》一文中，大讲独行精神，很有种独立的狂傲气质。读他的文章，有孟子式的气势、司马迁式的苍润，也多了几分李贽式的冷峻。中外狂人的话语方式，我们几乎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。如那篇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气如江河，势如暴雨，毫无温吞柔软之气，所言之理，环环相扣，把“保皇党”的柔弱之态说得一钱不值。他讲民族史、革命史，都不是凭空而谈，而句句有本，读了也让人信服不已。尼采是大赞“超人”精神的，章氏似乎便染上了这一个性。他论述问题，逻辑上一以贯之，没有迂回的余地。理论上的不含糊，富有确切性的思维，此其一；以现实来看历史，又以历史读出现实，绝无书生气，此其二；上下左右，古今中外，视界大开，能于世界潮流中感悟中国社会的角色，此其三。仅此三点，他的思想、观念、人格便足以令当世人惊愕不已。他实际上，已在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启蒙角色。鲁迅这样描述过对章太炎的感受：

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，即日东渡，到了东京，不久就主持《民报》。我爱看这《民报》，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典，索解为难，或说佛法，谈“俱分进化”，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，和××的×××斗争，和“以《红楼梦》为成佛之要道”的×××斗争，真是所向披靡，令人神旺。^①

章太炎身上流动的是一股汉文化史中少有的阳刚之气。无论在哲学观、文化观上，都有别于古人。而他又是个功底深厚的汉学家，这对中国青年学子而言，可谓是真正的益师良友。

那时留学日本的学生，大多是向往西方学术的，德国古典哲学、浪漫诗学、美国的人权思想、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等，颇受人欢迎。而奇怪的是，

^① 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，第546页。

章太炎一到东京，就吸引了众多青年，鲁迅、周作人、钱玄同等人，都随他去学起小学来了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个谜。随太炎先生读《说文解字》，固然有学术上的心理需求，但更主要的，恐怕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引力在起作用。章太炎的身上，那时集结了东西方文化中宝贵的东西。他把国学的精华，与西洋哲学中的个性主义，较好地体现到自己的言行中。开一代人生哲学之先，且领导了反满抗清的思想解放潮流，这是他难得的一面。时至今日，读他近百年前写下的文字，依然可感受到那颗跳动的心。痛斥清朝昏庸，复兴中华学术，又以独立不倚的品格躬行革命，确让人看到了他可贵可爱的一面。

3

若谈汉学，章太炎可说是座高峰，后人难有超越他的。看他关于“小学”、“经学”、“史学”、“诸子”、“文学”等著述，我们只有叹服。在我看来，国学之中，“小学”、“经学”是最见功底的，一般人很难进乎其里，又超乎其中。但章氏做到了。不仅做到了，还能以哲学、宗教学等观点，对历史旧迹进行取舍，溯本探源，从容自若，洋洋乎有大家风范。章氏属“古文学派”，他反对“今文学派”的臆断附会之说，所以治学之中，多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据，几乎看不到什么生硬的演绎。这是他可取的一面。学术方面，他钻研极深，历代重要典籍，几乎都看了，且重点部分烂熟于心。如对《汉书》、《说文解字》知道之详，世人皆知。诸子百家的书，他几乎也都看了，直陈利弊，毫不闪烁其词，真真是自由评述，得古人精神的要义。他对孔孟诸人的评说，很平易到位，人物的心态、精神风尚，尽入眼中。古人的一言一行，均被他画活。广博，也是一个特点。世人说中国的比较文化学，以钱锺书《管锥编》为最。但读一读章太炎的国学研究著作，其实亦可感受到此点。他于先秦著作中，多看到与西方文化异同的地方，且多有对比，有些思路，并不夸张，如墨子学说之于基督教文化，汉儒与佛教，伊斯兰文明与中原一些士大夫之心态等，所做的简单比较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治学时的自信心态，也是一大特点。他谈中国文化，是自立一门的。独特的视角，生出独特的文化观，我们看了，很有种兴奋的感觉。如他对朱熹治经时的荒谬之言、欧阳修学术上的浅薄之处，都说得理直气壮。旧儒治学，多温文尔雅，唯太炎先生，仿佛一斗士，于故纸堆里翻来翻去，或喜或

怒或悲或哀,这在学术史中,甚是少见。

反对以意为之,坚持客观公正地治学,是他一生的追求。中国的典籍浩瀚如海,但因年代之久,多汗漫不清。或因时代变迁,世风多变,则典籍亦被后人所歪曲、增删,真伪难辨是个问题;众说纷纭,又是一个问题。章太炎不像王国维那样以考古、实证而匡正谬说,而是以史料的甄别、逻辑的推理、理性的思考而为之。如反驳欧阳修的怀疑主义时说:“欧阳修经学疏浅,首疑《系辞》非孔子作,以为《系辞》中有子曰字,决非孔子道。然《史记》自称太史公曰,太史公下腐刑时,已非太史令矣,而《报任少卿书》犹自称太史公;即欧阳修作《秋声赋》亦自称欧阳子,安得谓《史记》非太史公作、《秋声赋》非欧阳修作哉?”这属于逻辑上的反诘,自有他的道理。还有一种方法,是思想内容的归纳,以史实证史实,以典型事例证明普遍的法则,如评朱熹的学术云:

6

朱晦庵误解“郑声淫”一语,以为郑风皆淫,于是刺忽之诗,皆释为淫奔之作。陈止斋笑晦庵以“彤管”为行淫之具,“城阙”为偷期之所,今《集传》、《静女》篇无此语,盖晦庵自觉其非而删之矣。凡《小序》言刺者,晦庵一概目为淫人自道之词。自来淫人自道之词未尝无有,如六朝歌谣之类,恐未可以例《国风》。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,显背“无邪”之旨,孔子何以取之?昔昭明编辑《文选》,于六朝狎邪之诗,摈而不录。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、《洛神》之属,别有托意,故录之(见《荈汉闲话》)。昭明作《陶渊明集序》,谓《闲情》一赋,白璧微瑕。昭明尚然,何况孔子?晦庵之言,亦无知而妄作尔。^①

这样的思路,在他那里可以经常看到,学术的要义,被他较严谨地勾勒了出来。

章太炎对心理学、社会学这类西方文化的东西,是很留意的,这大概是他后来治国学时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原因。我注意到他论述人性的时候,对孟子、杨子、荀子诸人的人性观点之对比,不是就事论事,简单类

^① 章太炎:《国学略说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,第78页。

比,而是参之西洋心理学学说,论述很有现代人的感觉,迂腐气少了大半。至于在“性善”、“性恶”问题上,孟子与荀子的观点所以不同,他确能从社会环境和人生经历入手加以思考,看后很让人服气。他说:

至于性善、性恶之辩,以二人为学入门不同,故立论各异。荀子隆礼乐而杀《诗》、《书》,孟子则长于《诗》、《书》。孟子由诗入,荀子由礼入,荀子以礼入。诗以道性情,故云人性本善;礼以立节制,故云人性本恶。又,孟子邹人,邹鲁之间,儒者所居,人习礼让,所见无非善人,故云性善;荀子赵人,燕赵之俗,杯酒失意,白刃相讎,人习凶暴,所见无非恶人,故云性恶。且孟母知胎教,教子三迁,孟子习于善,遂推之人性以为皆善;荀子幼时教育殆不如孟子,自见性恶,故推之人性以为尽恶。^①

以此方式论证古人思想不同的根源,让人耳目一新。虽然论证的渠道有多种,可章氏的思路,是可以让大多数读书人接受的。这是什么缘故?我以为是方法论上的原因,这里几乎是看不到玄学式的臆想。所以,我觉得章氏身上的实在精神、进取精神,以及那种昂扬的生命锐气,确是值得中国学人永远学习。他曾赞赏王船山所说的“自立精神”,以为南宋所以亡国,实在是无“自立精神”之故。章氏看到了为文与为人的这种自立的重要性,所以在他的世界里,这一精神便愈加弥漫开来。

7

4

读章太炎之书,总惊讶于他的大气。史书也好,经书也好,人与书分离之状,几乎看不到了。他似乎总是从文字之后,找出那一时代的人——作者的气质、品格、才学、德识等。章氏读史,其实不如说在读人。他对形形色色中国人的判断,真如面容严峻的法官。他似乎特别愿意挑剔历史,以致古人几乎没有几位完整的楷模。这是不是太狂妄?旧时的儒生谈及经典,多耽于思想、境况的演绎。而太炎先生独还原出史书中的人物,在经史子集中,读出诸种人生。他所以成为思想家、启蒙主义者,这

^① 章太炎:《国学略说》,第151页。

或许不能不是个原因。

历史都沉没于时光的空洞里，欲还原它已属大难。但顺着文字的旧迹，不也可见出昔日的斑斑痕痕？太炎先生是相信“文以气为主”的，要不然他不会那么注重文章的格调。翻看 he 论述文学史的文字，多怨语，讥讽文人学士萎缩的人格，几近咒声。他那么崇尚汉代以前的文人，好像只有那个岁月，中国的“士”阶层还有着像样的人。魏晋以下，柔风日多，唐宋之典雅已渐失武士之风，宋明之短调词赋已少见血性。在太炎先生看来，中国文学的衰落史，其实正是人性萎缩的历史。这一判断颇有些骇世惊俗，几千年无数豪杰勇士的业绩，均在他凌厉的目光下黯淡起来。其实平心而论，唐宋之后，文人不都像章氏所说那么小气，那中间不照例还有李白、苏轼式的男人？但在太炎先生看来，中国人的弱，是体格上的弱与精神上的弱共同构造的。这样，他便把完整的、理想的人格，与肉体的健壮、精神的阔大联系起来。他说：

8

《七发》气势浩瀚，无堆垛之迹，拟作者《七启》、《七命》即大有径庭。相如、子云之赋，往往用偏旁数字堆垛以成一句，然堆垛而不觉其重。何也？有气行乎其间，自然骨力开张也。降及东汉，气骨即有不逮。然《两都》、《两京》以及《三都》，犹粗具规模，后此则无能为之者矣。此类文字，不关情之深，理之邃，以余度之，殆与体气有关。汉人之强健，恐什佰于今人，故其词气之盛，亦非后世所及。今人发古墓，往往见古人尸骨大于今人，此一证也。武梁祠画像，其面貌虽不可细辨，然鼻准隆起，有如犹太、回回人，此又一证也。汉世尚武之风未替，文人为将帅者，往往而有。又汉行征兵制，而其时歌谣，无道行军之苦者。唐代即不然，杜诗《兵车行》、《石壕吏》之属可征也。由此可见，唐人之体气已不逮汉人，此又一证也。以汉人坚强好勇，故发为文章，举重若轻，任意堆垛，而不见堆垛之迹，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。^①

以此种视角看中国的文学，非章氏而他人所难为。这个思路的背后，亦即

^① 章太炎：《国学略说》，第209页。

梁启超所说的“国民性”。梁启超的“新民说”里，所讲的新型民气，与太炎先生期待的相似一极。我由此想起鲁迅广搜“汉砖”、“汉画像”，并盛赞“汉唐气魄”，是不是也受到了章氏的影响？沿着这一思路，去重新思考鲁迅所寻觅的“民族的脊梁”，大概也有这类的余绪吧？

鲁迅留学日本时，也是尚武的。尚武精神，与民族自立精神，在那时几乎是同义词。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，那期间，就多武士风采。章太炎、鲁迅属两代人，但在读史做人上，同求于此理，多少让后人可悟出些什么。所以，每每从他们文字间，读出一些不羁的怒气，那也是对衰落的民族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的无奈。章太炎一生出入于学界与政界之间，虽多坎坷之苦，但那文字与人格相契无间的结合，也正说明了他的伟大。

《馗书》是太炎先生的一部永垂史册的巨著，虽仅薄薄一册，但那气韵之高，视野之广，论述之深，均令同代人叹为观止。这是一部集诗情、哲思、政治、文化于一体的奇书，也如执矛的堂吉诃德，多雄奇、浪漫的风姿。谈论典章制度、文化沿革，《馗书》自有失当之处，但它的包容宇宙式的人文景观，直到今天，仍散出热力。试与王国维的《观堂集林》做一比较，虽同样体大精深，章氏以血为墨，喷射的是生命的热力，王氏则如足不出屋的智者，多神秘与宁静。前者如风如雨，后者似烟似雾。章氏让人去做些什么，王氏则叫人思考些什么。同样是开阔与博大，而状态竟如此不同，文化哲人的思路要达到高度统一，真是殊难的事情。

5

考太炎先生的一生，“用国粹激动种姓”的治学精神，最为感人。《馗书》，可谓杰出的代表。但倘若仅拘于此点，他还不能算是一个巨匠式的人物。我觉得，章太炎的深广，是由于他的哲学意识使然。在一定程度上讲，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哲学家。虽然他的思想过于庞杂，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，但就根本而言，他是试图把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进行嫁接的先驱者。这种尝试，直到今天，对人还有很大的启示。

文化的检讨，如不上升到哲学与宗教的层面，要打通古今，终不可解。太炎先生后来越发注意到这个问题。他不满足于乾嘉学派以来的“小学”成绩，不久又将兴趣转向哲学与宗教。从古希腊文化到德国哲学，从基督教到佛教，他都涉猎过。柏拉图、费希特、叔本华、康德、释迦牟尼等，常出

现在他的世界里。尤其是康德,那种二元论的思想对他启悟很大。借用康德的思路,他把佛教中的“真如”、“神我”等概念,引入到认识论的世界中。中国哲学中,向来缺少严明的逻辑思维,对客体与主体的含糊不清,常使人陷入一种混沌的静悟里。章氏似乎看到了这一点。他借用康德式的先验形式,对人的主体世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,应当说,这是不易的。王国维当年在认识论上的某些突破,也得力于此。章太炎那代人思维的开阔,德国古典哲学的启蒙,可说是功莫大焉。他在《蕤汉微言》中,不止一次提起过康德精神的伟力,他后来对“道”、“真如”、“唯识”等问题的解释,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康德的影响。康德使人分开了主体与客体,将人的认知界定在一个限度里,人只有意识到了这种有限,才可能从某种幻象解脱出来。但这种二元的、不可知的意识,章太炎并不能全接受。他之所以不想陷入康德式的悖论里,仍是希望在一中求真的路走下去,从而抵达彼岸。中国的学人,那时是不希望在求索中被不可知的迷雾因素住的。所以,章氏后来转向佛学,希望以佛学精神超越古典哲学的局限,这是很可理解的事情。于是,在他的思想里,康德精神与佛学意识常交织在一起。太炎先生说:“康德见及物如,几与佛说真如等矣。”但同时又不满于不可知论,又叹道:“终言物如非认识境界,故不可知。此但解以知知之,不解以不知知之也。卓荦如此,而不窥此法门。”为了弥补康德形而上学之不足,章氏把庄子学术、佛学义理引入认识论中。后来,他干脆远离康德,说“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,这才是‘善权大士’”。章氏在哲学领域转了一个圈,忽然发现,东方的佛学,已把许多事情说清,虽还有不周密的地方,但用儒道学术进行修补,大概可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哲学体系。

这里,章氏的思想是破碎的,很难说他能真正构架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哲学殿堂。他的哲学观,最终被“求知”这一儒家化的东西所阻拦。在他身上,很难感受到宗教的情绪,虽然他亦写过《建立宗教论》这类文章,但在内心深处,他是排斥神性的。他大力主张兴办佛教,说“继起之宗教,必释教无疑也”。但他眼里的佛教,“与其称为宗教,不如称为‘哲学之实证者’”。因为认为佛法本不是宗教,所以,他便把老庄哲学、德国古典哲学、佛学嫁接起来。这种嫁接,使他的世界变得扑朔迷离,一会儿强调“自我”的力量,一会儿又被“宇宙本非实有”这类课题所困惑。但他认为“境缘心生,心仗境起,若无境在,心亦不生”是对的。在这个基础上,他主张求

知,益智,以德化民,反对神性,这给他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进取性和生命锐气。他反对将对象世界神秘化,例如在《驳建立孔教议》中,指出“宗教至鄙,有太古愚民行之”。这些观点,旨在把哲学与振兴国民精神联系起来。鲁迅在这类思路启示下提出的“立人”说,也是这个意思。中国近现代思想家,所以近哲学而远宗教,或者以宗教而谈哲学,从这里可以找到些答案。晚清以来,教会学校培养了那么多学生,但其中少有宗教学家,而大多成为文学家或文史专家,恐怕也与这个原因有关。因为,对那几代人来说,民族革命、种族进化,比个体的纯粹形而上学要重要得多。即使像鲁迅这样具有浓厚的形而上色彩的人,也只是在《野草》里晃动一下自己的哲思,尔后便走向社会革命中去了。

章太炎的哲学意识,与他的汉学研究,差不多呈现出相同的色调,即趋于精英化和过于学院化。他思考的问题相当深广,但缺少的却是平民化的东西。倘若他的文化视野能稍向平民阶层靠拢一下,也许不会那么和者甚寡。他在《建立宗教论》中曾说:“宗教之高下胜劣,不容先论。要以上不失真,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。”这是很好的思路。可具体思考问题时,他又立言滔滔,思维并不统一,不能一以贯之,或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认知范式,结果终流于驳杂、艰涩。我以为章氏的失误在于过于看重佛学和庄子哲学,当他相信进化论,以“善恶并进”来解释历史,以康德所言之主体意识思考己身的时候,他的思想是充满锐气的。可一旦将西学精神与东方神秘哲学糅在一起,那种确切化的理性锋芒,便削弱了大半。佛学与庄子哲学好像已经包罗万象,但在对人的具体行为上,亦即改造自然与社会方面,缺少参与力。倒是后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潮,以及美国实用主义、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,影响了后来文化的发展。佛学与庄学固然博大精深,但已不能生成新的文化信息,那种静态的玄想,除了益智外,对社会变革的推动可说是微乎其微。

但太炎先生思想中最迷人的地方在于,他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文化,对任何学说均不迷信。《论佛法与宗教、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》一文中就有言:“若是拘守宗法,必定说那一宗长,那一宗短,强分权教、实教、始教、终教许多名目,那就是拘墟之见,不是通方之论了。只要各取所长,互相补助,自然成一种圆满无缺的哲理。”不断地怀疑,不断的进取,这是他可贵的一面。但过于疑,又贪大,想穷尽真理,以一种巨大的框架结构自己的